中国军事经济思想史简论

张　远　著

学林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这时正是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的历史时期，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都希望本国在兼并战争中获胜。于是富国强兵成了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努力目标。“富国”是经济，“强兵”是军事，经济和军事一开始就这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很多因素，它既是国与国之间军事力的较量，也是国与国之间经济力的较量。当时的许多思想家都懂得军事离不开经济，在这方面有很多深刻的论述。古代国家的经济力主要决定于农业，因此在兼并战争进入决定性阶段的战国时期就产生了农本思想和农战思想。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中包含有丰富的军事经济思想的内容，这是最好的证明。春秋战国是如此，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也是如此。

“富国”是一个易产生歧义的词，它既可以指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可以指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前者是广义的富国，后者是狭义的富国。从后一要求出发，富国就可能是聚敛的同义词。因此中国古代既有人主张富国（广义的富国），也有人反对富国（狭义的富国）。北宋的王安石说富国就像父亲和儿子关起门来做生意，“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因此他以“理财”来取代广义的富国。用词的改变无关于实质的变化，实质是经济为综合国力的基础，军事的强弱总要以经济实力作后盾。所以主张富国也好，主张理财也好，都不能回避同军事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不管人们对富国的态度如何，军事的经济问题总是一个重要的议题。秦汉以后军事经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正是这种要求的反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受列强宰割的命运。多少志士仁人希望中国迅速走上富强之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随着西方军事和经济学说的传入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中国的军事经济思想也

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西方经济学说的影响下，发展对外贸易，振兴实业，实现工业化，成了先进的中国人的追求目标。这时的军事经济思想已不再是农业社会的军事经济思想了，它逐步同西方军事经济思想接轨，又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中国近代军事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军事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必然包括对军事经济思想的研究，因此已有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成果中对中国历代的军事经济思想多少已有所涉及，但这还不属于军事经济思想的专题研究。要进行这方面的专题研究，研究者除了需有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专门知识外，还要有军事学的专门知识。本书作者张远博士原是军事院校的教师，熟悉军事理论。他先后三进复旦：第一次是进助教进修班学习，第二次是攻读硕士学位，第三次是攻读博士学位，都是以中国经济思想史为专业。由他来研究中国军事经济思想是很恰当的人选。本书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情况复杂，史籍浩繁，要写好中国军事经济思想史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本书没有写成通史的形式，这也是原因之一。他将中国历代的军事经济思想归纳为形成、发展和变革三个时期，各时期再按专题论述主要军事经济思想，做到了重点突出，条理分明。这是国内第一部中国军事经济思想史著作，张远博士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应该受到重视。相信本书的出版会引起有关读者的兴趣，并有助于符合中国特色的中国军事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叶世昌

于复旦大学

（叶世昌系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博导）



张远，经济学专业硕士生导师。1954年生于南京市一个军队干部家庭。1969年中学毕业后入伍。1979年考入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经济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年考取复旦大学经济系经济思想史专业硕士生，1994年获取经济学硕士学位。1996年考取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史专业博士研究生，1999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政治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自1981年以来，张远在《学术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管子〉中的军事经济思想》、《宋代的军马管理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事经济思想》、《薛暮桥军事经济思想简论》、《薛暮桥战时经济思想》、《宋代的军事与经济关系思想初论》等30余篇论文。主编、副主编4本著作。本书是张远独立完成的第一本专著，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古代军事经济思想的发展，填补了国内在这方面的空白。

目　　录

导　论……1

上篇　中国军事经济思想的形成……7

农战说……8

军事经济资源配置说……17

军事经济人口说……25

战争成本说……30

军事运输说……36

战时经济动员说……40

中篇　中国军事经济思想的发展……43

军事与经济相互关系思想……46

军费筹措及使用思想……56

军队生产经营及管理思想……68

军事经济人口思想……81

军马思想……94

战争成本思想……111

军事经济运输思想……122

下篇　中国军事经济思想的变革……133

富强论……135

军费论……141

海军论……153

军事院校论……163

军事运输新论……170

军事工业论……179

结　语……195

后　记……20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导　　论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战争和经济从来就不是两个完全孤立、没有联系的事物。恰恰相反，两者从一开始就以各种具体形式相互渗透、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如同军事从来就是社会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军事经济从来就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实质上是军事物质力的对抗，军事经济力的角逐。法国人福煦对战争物质力的比较有过一个说明：

假定你用两个营的兵力来对抗敌方的一个营。

那么你也就是用二千人去对抗一千人。

假定步枪是一分钟发射一颗子弹，于是一千人的防御者就一共发射了一千颗子弹。

同样的，二千人的攻击者也就发射了二千颗子弹。

结果是攻击方面占了一千颗子弹的利益。

再假定步枪每分钟发射十颗子弹，于是一千人的防御者在一分钟之内就可以发射一万颗子弹。

同样的，二千人的攻击也就会发射二万颗子弹，结果是攻击方面占了一万颗子弹的利益。

所以火器的进步使射速增高了，这种物质的优势是对攻击有利的。

富勒对此批评说：这种数学计算很不合理。“因为一千名防御者是卧伏着的，其所构成的目标仅相当于攻击者的八分之一，所以攻击者的命中率应减去八分之七；所以结果是防御者占了七千五百颗子弹的利益，而不是攻击者占了一万颗子弹的利益。”①他们的分析、比较表明，战争确实离不开经济。高尔兹进一步指出：“近

代的战争已经变成一种国家的生意经。”福煦证明说，自从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获胜后，德国人不仅使他们自己在欧洲占有一种支配性的地位，而且也为他们的工商业奠定了基础。同时，它在关税和贸易两方面，也从法国获得了最惠国待遇。可以说，德国在1870年的胜利已经使每一个德国人都发了财，每个德国人都分享了其利润。

这种情况对于其他国家也是这样。日本在1894年中日战争中，根据《马关条约》，不仅获得中国的领土割让，而且所获得的商业利润更是非常巨大。威海卫和鸭绿江口的巨炮已经为一支商业舰队铺好了道路，它首先向东方，然后再向西方，输出日本的产品。

今天，战争与经济已经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毛奇甚至说：“证券交易所已经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为了保护它的利益，即使发动车队去从事战争也在所不惜。”②

总之，历史已经证明，战争的发生是商业化的，今天的战争更是一种整个国家所从事的商业行为。所以，对这种军事经济现象进行研究也就成为必要。军事经济学就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科学。

军事经济学是研究军事和经济的矛盾运动及发展规律的科学。军事经济思想史是研究军事经济思想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过程，总结前人军事经济思想成果的科学。军事经济思想是对军事经济活动的能动反映或自觉认识。这里所说的“军事经济活动”是直接与军事活动相关联的经济活动的总称。从其内容上看，这主要是指专门为满足军队武器、装备和军需品的需要而存在的特殊性经济，是一个包括武器装备和军需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个环节在内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是与一定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相联系的。军事经济活动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军事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实践性和历史性，决定了军事经济思想史具有很强的实用性、理论性和多学科渗透性。

军事经济思想史从空间范围看，可分为外国军事经济思想史和中国军事经济思想史；从内容属性看，可分为军事货币思想史、军事财政思想史、军事交通运输思想史等等。

中国军事经济思想史是研究中国军事经济思想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过程，总结前人军事经济思想成果的科学。中国军事经济思想史与外国军事经济思想史在研究对象的一般性上有许多共同点，但由于各自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不同，又有很大的区别：（一）中国军事经济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有一些精辟的军事经济思想。在大量的中国古代兵书和其他典籍中，很少有完全不结合经济来讨论军事问题的。外国军事经济思想史（主要是西方，下同）虽然也出现得较早，但其涵盖的内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如中国丰富。（二）中国军事经济思想史的资料非常零碎。中国军事经济思想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基本上没有系统的论述和成形的著作。各个历史时代的军事经济思想材料都是零星分布在浩瀚的史料中。仅就《四库全书》而言，经部有10255卷，史部有20844卷，子部有16354卷，集部有28961卷，合计共76414卷。《四库全书》未收的古籍以及近现代的中国各类书籍更是汗牛充栋，不胜计数。故中国军事经济思想史料虽然十分丰富，但如此分散在浩瀚的书海中，其搜集、研读的难度可想而知，这使得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相比之下，外国军事经济思想史料一般都集中在各类专著中，后人研读比较方便。（三）中国军事经济思想史研究严重滞后。外国军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起步较早，而且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外国从一开始就是把军事经济理论与军事经济史、军事经济思想史结合起来研究，或者是把经济学与军事经济学、军事经济思想史结合起来研究，许多军事经济学著作本身就包含了军事经济思想史的内容。这种研究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渐次达到高峰，其代表作主要有：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832），约米尼的《战争艺术》（1837），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中有相当篇幅论述军事经济理论问题，德茨的《战时经济概论》（1928），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争论》（1935），凯恩斯的《战争经费和国民经济》（1939），庇古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1940），严松书店（日本）的《国防经济学大系》（1942），柯尔年科的《论军事经济学的对象》（1970），查尔斯·丁·

希奇和罗·N·麦基因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1960）等。此外，1948年，萨缪尔逊所著的《经济学》出版时，该书第三十六章标题是“战争和国防经济学”，这是战后美国军事经济理论比较权威的公开著述，其中也包容了军事经济思想史的内容。而在中国，系统的军事经济学研究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系统的军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则更加滞后。

中国军事经济思想史的特点及军事经济活动和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现状决定了中国军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首先，有助于军事经济学理论的学科建设。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基本理论体系、学科和研究方法的成熟、完善。中国军事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但进步很快，尤其是近年来，涌现出一批有代表性的专著，主要有：张振龙的《军事经济学》（1985）、库桂生和宋振铎的《国防经济学概论》（1986）、刘义昌和尹希圣的《世界国防经济概论》（1987）、刘大军和王祖敏的《中国社会主义国防经济学》（1987）、樊恭嵩的《国防经济学》（1988）、曹智英的《军事经济学概论》（1989）等。同时，相关学科发展也很快，《国防人口论》、《国防经济效益浅论》、《国防经费论》、《国防技术经济及分析》相继问世。但对于中国军事经济思想史而言，依然是涉猎者甚少，从而使军事经济学这门具有浓厚历史性的科学由于学科不健全而带有深深的缺憾；还由于中国军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本身就是对前人军事经济理论的分析、归纳、总结，这种工作可使今人在军事经济理论研究中少走弯路，提高研究工作效率，其研究的滞后也不利于军事经济学科的深入发展。

其次，有助于填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出现了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赵丰年的《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四十年代则产生了夏炎德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等有影响的专著。但由于受社会制度及历史条件的局限，并未进一步形成气候。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学术界共同努力下，这门学科

有了长足发展，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是：胡寄窗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三册）、赵靖和易梦虹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二册）、叶世昌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三册），以及侯厚吉与吴其敬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三册）、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四册）等。其学科覆盖面不断扩大，涉及财政、金融、人口和管理诸方面，但这些论著同样也基本未涉及军事经济思想史，因而也就同样需要加强这方面的挖掘、研究工作。

再次，有助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军事经济建设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继往开来、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国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国情。而中国国情包括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民俗等诸方面的情况。它们各自既有现实状况，也有历史发展；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并交织在一起。中国军事经济建设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加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军事经济建设的发展，促进我军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加强军事经济理论的研究，重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当然也必然呼唤中国军事经济思想史学的诞生，从而使人民解放军及整个国防事业能在不断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持特色，少走弯路，加快发展。

军事经济学研究的本质在于，把军事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去描述（复原）、研究（探讨）军事经济活动内在的更深层次的东西。军事经济思想史不过是更多地借助经济分析来完成这一工作，而中国军事经济思想史则是侧重于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出发，更多地借助经济分析来从事这项工作。事实上，在开始这种研究之前，我们就已经发现，历史图景的复原和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往往受到人们知识结构的限制而遭到扭曲。由于现代社会许多人对于人类军事经济思想的沿革知之不多，因而以战争为核心的军事活动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种种因素、环节、关系远没得到应有的揭示，这样，一些相关的社会科学研究因“盲区”太大而存在着极

大的缺陷，而且在梳理历史因果关系时往往会弄出许多外行的评述；在借鉴今天的发展时又会忽略不少根本不应该忽视的东西。

古人曾说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③由此可见战争事务对于人类日常生活的重要程度。“战争是新生社会的助产婆”也已成为现代人的常识。但现代学术的误区之一是将战争研究的范围局限在纯粹的军事思想史领域，人为地同社会经济思想史研究之间造成深深的鸿沟。美国学者小戴维·佐克和罗宾·海厄姆在其合著的《简明战争史》中曾说过：“历代史学家的错误在于忽略了时代的研究，而偏重人类经历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职业军人的错误在于仅仅论述范围狭窄的战术问题，供其他专业人员借鉴和学习。把战争研究和社会研究分开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在许多世代里已经导致种种可怕的后果。”如同对社会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和对战争的研究要结合起来一样，对军事思想的研究和对经济思想的研究及对历史的研究同样也应有机结合起来。这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经济学家必须研究军事思想问题，所有的军事学家必须研究经济理论，但至少应该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应该有一批学者专注并精通于军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注释：

①② ［英］富勒：《战争指导》第134～137页，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

③ 《左传·成公十三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　篇

中国军事经济思想的形成

军事经济学产生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但军事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却是漫长而悠久的，因为其所根植的沃壤——军事经济活动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始终是存在的。

中国军事经济思想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各诸侯国兼并战争频仍，武装冲突烽火不断。战争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社会经济活动被深深地印上了这种时代烙印。在战国诸强争霸的历史活动中，研究军事谋略、政治技巧和经济筹划已是当时那些陈义甚高的思想家和心雄万夫的政治家最具有时代品位的主流倾向，军事经济活动及思想厕身其中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这一时代思想理论上的反映，《六韬》、《商君书》、《管子》、《尉缭子》、《孙子兵法》、《吴子》等典籍中均包含了丰富的军事经济思想。尽管这一时期中包容了军事经济思想的典籍的数量不是很多（相对于后世而言），但它们中论述的军事经济思想就其范围看较为宽泛，就其内容看比较丰富，且均对后世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体上，这一时期的中国军事经济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以下方面。

农战说

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军事活动的水平和规模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活动的水平和规模，同样，军事活动的状况也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当低下，军事活动尚未从整个社会生产活动中真正分离出来的我国远古时代，由于军事活动的空间相对狭小，其持续的时间一般不太长。加上尚未建立起常备的战争指挥机构和常备军等原因，军事经济还没有成为国民经济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而军事经济活动的规模制约着战争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及成败，鉴于此，中国古代战争史中的有些战役如《左传》中有名的五大战役——韩（今河南省中部和山西省东南部）之战，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之战，鞍（今山东济南）之战，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之战，邲（今河南荥阳北）之战，虽被后人认为是中国战争史上的巨大战役，然而，这些战役皆无过百里之外，时间上皆一日而毕。规模之微，颇类似近世的乡村械斗①。不过，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看，相对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发展规模而言，军事活动的经济消耗，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已是相当巨大的了。孙子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②“日费千金”是孙子对当时军事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消耗作出的基本估价，也表明了这位大军事家已把军事经济活动作为实施军事战略战术的物质前提。他不仅提出了“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物质储备）则亡”③，而且还说战争“久则钝兵挫锐”，“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因而“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④。这里，“无粮食则亡”是讲经济活动对军事活动的制约，而“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则是强调了过度的军事活动制约国民经济发展。

商鞅也说：“兵起而程敌”，“食不若者勿与久”⑤。他是从敌我双方对比中强调这种影响的。即出兵时要充分估计敌我双方情况，尤其是当粮草储备不如敌方充足时，不应与敌长期作战。此外，《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中都有类似的思想。这些观点立论的根据之一，就是一般意义上军事活动的耗费与一般社会经济之间的互相关系。

既然经济力、物质力是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

可或缺的战略要素，那么潜在的经济力如何才能转化成现实的战争力量呢？《商君书》和《管子》的“农战说”已在历史可能允许的范围内最为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其关键点在于：在经济力与军事战斗力之间需要借助若干的中间环节才能联系起来，并完成能量的转化。第一个环节是历史的、具体的经济力内容应着重于哪一点上？第二个环节是这个具体的经济力着重点在量上应达到什么程度才能在影响军事活动上有效力？第三个环节是在以上两个环节已沟通的基础上，经济力应以什么历史形式作用于军事战斗力？

在对每一个环节的说明中，商鞅和《管子》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在农业社会中，发展经济力就是以农业为本。这表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认识到，在当时，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因此，发展经济主要是发展农业。讲军事和经济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讲军事与农业的关系。这样他们就使上述关于军事和经济一般关系的论点更加具体化，并使之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色。军事与农业的关系，《管子》论述得最详细。首先，农业为战争提供了粮食。“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⑥在中国古代战争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尚不发达，军需物资主要是粮食，有所谓“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一说。一国的粮食多寡，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而且决定了该国在战争中能否立于不败之地。所以《管子》认为：“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⑦还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⑧重粟则重视粮食生产，就是重视奠定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其次，农业为国家提供了财政收入。农业既然是古代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农业收入自然也就构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因而，如果一国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则国家不仅可以直接筹措到足够的军需粮食，还能有宽绰的财力去购买兵器等其他军需物质。为此，《管子》强调：“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⑨恩格斯指出：“暴力的胜

利”是“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⑩。商鞅、《管子》从农业社会的实际出发，将经济力、物质力历史地赋予农业这样的具体内容并使之与夺取战争胜利联系在一起是非常正确的。

第二个环节在于说明农业劳动生产力。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既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增加农业劳动人口来达到，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以取得效果。当然，从根本上看，应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马克思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11)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剩余农产品越多，才越有可能增加财富积累并为战争提供粮食等经济资源。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春秋时期，铁器逐步推广到各个社会生产领域，铁农具逐渐普及起来。而铁器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

战国中后期，铁器成为社会生产生活上不可缺少的工具。《孟子·滕文公上》说，当时的农民使用铁器耕地。根据考古发现，在战国七雄的全部地区，都发现有战国中、晚期的铁农具，而且数量大，种类多。生产工具的变革对推动先秦及以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是相对的，这在农业社会中尤其如此。而且，战争对经济资源的需求常常具有爆发性和不可预知性，在诸侯争强、军备竞赛加剧之时，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所带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远远满足不了军事活动的需要。于是，增加农业劳动人口便成了一个最易采用的方法。商鞅认为：“令民归心于农”是“治国之要”(12)。他用一个简单的比例数字来说明农业人口应占一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13)这一比例说明，一国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强。这个思想也反映了在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条件下，国家必须花费最大量的人力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去生产更多的粮食等重要经济资源，以应付战争之需要。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第三个环节就是要选择具体的历史社

会形式去完成经济力、物质力向军事战斗力的现实转化。这种历史社会形式能否选择好对国家富强至关重要。选择得好，可实现国富民强；选择不好，则会军事、经济两耽误，导致国破民贫。为了实现富国强兵，商鞅第一次提出了农战结合的概念。他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⑭我们知道，人是战争的主体，也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但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兵力与民力又互相矛盾。“国不可一日无兵，兵不可一日无食。”⑮“农战”结合实现了寓兵于农，兵农合一，既不影响民力，又能节省养兵之费。这是中国军事经济思想史观丰富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时思想家们所寻求到的将经济力、物质力转化为战斗力的最为合理的社会形式。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大力奉行农战政策，从而国力增强，一跃而成为后来居上的封建强国，并最终统一了中原。

农战思想的首创者是商鞅，它的提出得到许多思想家、政治家的认同。署名姜尚的《六韬》认为，战争中的各种战具器械，都存在于庶民生产和生活中，庶民平时分耕田地为农，战时携带器械为兵⑯。正因为如此，战国时期，富国强兵思想得到大力提倡，各诸侯国纷纷实行了万乘农战政策。

商鞅的“农战”概念，一方面表示封建国家要富强，一定要抓住农和战这两个根本，实行农战方针；另一方面表示从事农和战的应是同一种人——农民。从表面上看，农民和战士两种社会属性同时体现在一种人——农民身上似乎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在批判纳骚·西尼耳时说过：“士兵像很大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一样，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些非生产劳动者，无论在精神生产领域还是在物质生产领域，都什么也不生产，他们只是由于社会结构的缺陷，才成为有用的和必要的，他们的存在，只能归因于社会的弊端。”⑰理解马克思这段话应注意两点：其一，军事生产是人类社会特殊斗争的一种特殊产物，它不能提供给社会资本类产品和消费类产品（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除外），因而具有非生产性质，是一种所谓的非生产性产业。军事生产会耗费大量资本类资源和消费类资源，但却不能直接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